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东方湖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雍容国图 弦歌不辍

本报记者 赵亮 曹玥

题记

初创于1909年的国家图书馆，于沧桑岁月中，薪火相传，弦歌不辍，走过112年光辉历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重镇。

著名藏书家陆昕说：国家图书馆是由无数人的世界和人生积累而成，它既古老又年轻，它将古老的文化和新颖的思想完美统一起来。

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国图尽展大家雍容风范。



镇馆之宝的16年修复路

今年“五一”假期，国家典籍博物馆第四展厅人头攒动，“妙手补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正在展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古籍修复成果为主题的最大规模的展览。

展览中，《赵城金藏》的修复成果吸引了众人围观。泛黄的纸卷、拼接的缝隙，印刻着岁月的痕迹，记录了国图大规模开展修复工作的历史。

《赵城金藏》是一部刻于金代的大藏经，1933年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被发现。

1942年2月，时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接到情报，日本人想把《赵城金藏》占为己有。

抢救行动在深夜展开。1942年4月27日，二地委以运公粮之名，赶着牛车和驴车，在晚上8、9点钟入寺，12点左右全部装运完成，送往石峪集结。两个月之后，日军再次进行扫荡，史健命令将士背经转移。转移前，史健向战士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最终，历时两个半月抵达太岳根据地的核心沁源县，经卷被秘密存放至一处隐蔽的煤窑中，躲过扫荡。

可以说，《赵城金藏》是在战士背上保护下来的，它带有“红色基因”，若非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依旧专注保护文物，就不会有《赵城金藏》的传奇今生。

走过战火纷飞的年代，1949年4月30日，《赵城金藏》正式入藏国图。因当年藏经的煤窑阴冷潮湿，不少经卷受潮发霉，修书任务刻不容缓。

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杜伟生回忆，有关部门从北京琉璃厂等地调拨老师傅到国图，并全力保障物资供应。

在一份记载修书补贴的档案上，记者看到一组数字：按60元折合小米300斤，临时费300斤，修书费300斤。“现在看这些材料费算不上什么，但对当时的人民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杜伟生感叹。

1949年7月到1965年，16年间，修复师们终日伏案修复，《赵城金藏》终于“起死回生”。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告诉记者：“《赵城金藏》的修复培养了坚实的古籍修复队伍。现在，越来越多不同学术背景的年轻人加入了古籍修复工作，传统技法与现代科技在修复中有融合。”

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数据，截至目前，全国90%以上汉文古籍已完成普查登记，370万叶破损古籍得到精心修复，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7.4万部(件)。几乎每一部古籍背后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从15万字“文献报矿”到400期疫情专报

1953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有关部门开始探求我国地下矿产资源。矿产资源类型有哪些？储量有多少？这是一项浩大的调查工程。

“我们馆参考馆员刘汝霖那是活字典呀，他从浩瀚的文献资料中找出了许多矿产资料，最后送到地质部，得到了表扬。”几十年过去了，国图原副馆长鲍振西回忆起国图参与的矿产资源调查工作，仍旧自豪不已。

现任国图立法和决策服务部研究馆员张曙光告诉记者，国家图书馆从1953年起就开展了“文献报矿”工作。工作人员几乎遍查了史书中的食货志、地理志、方志里的山川志、物产志，搜集整理出各种矿藏的珍贵资料。

“过去没有电脑和数据库，查资料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时候的参考馆员个个都是大家，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基本功，查阅各类典籍文献，找出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料。”

最终，国图于1954年完成报送工作，并形成3万多字的《祖国二千年前铁矿开采和冶炼》、约12万多字的《中国古今铜矿录》等资料集。1958年，国图将资料汇编成册编印《馆藏采矿书目》。

“国图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国家不同年代的建设，这是一项神圣而艰巨的工作。”张曙光告诉记者，作为参考馆员，不仅要掌握丰厚的学科知识，有时候也要“逆行”冲锋，争分夺秒。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张曙光与同事每日工作到深夜，为专家提供咨询服务，并围绕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推出系列信息产品。“关键时刻，高效准确地为一线抗疫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的使命。”截至2020年12月底，国图共编制新冠肺炎疫情专报400余期，围绕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公共卫生机构应急能力等主题，开展了多项文献综述及专题研究。



从目录卡片到VR沉浸式阅读

在国图幽静的长廊中，几个陈旧的棕黑色柜子存放过一代读书人的记忆——目录卡片。

过去读者借书，需要在目录卡片中查阅书籍资料相关信息，将书籍检索号告知工作人员才能拿到书。曾担任外文采编部主任的李仁年，1965年便进入国图工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仁年说：“以前的目录卡片都是用钢板刻，有些人刻了几十年的钢板，手指都弯了。”

1982年，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孙培欣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考察。当看到那时候的美国已经采用机读目录，卡片目录仅作为参考使用时，孙培欣意识到，图书馆数字化建设时不我待。

当年国图还没有计算机。回到北京后，孙培欣团队租借了北京计算中心的机器，读取美国机读目录磁带。另一边，原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教育中心主任、自动化专家朱岩带领馆员实现国图编制的中国连续出版物机读目录参与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中心(ISDS)的数据共享。

经过研究人员两年的努力，1985年前后，国图制作了第一批机读目录，国图的电子信息化队伍也逐渐成长起来。



戏剧家曹禺与戚志芬的往事

看过新影厂纪录片《知识宝库》的观众可能会记得，影片一开始的第一个镜头：著名戏剧家曹禺拔通电话，找到北京图书馆的戚志芬，请她代查有关王昭君的史料。

接下来，一位精神矍铄的老馆员穿行在书架林立的书库，寻找、查阅着……

1961年12月，剧作家曹禺为了完成剧本《王昭君》及修改工作，曾委托北京图书馆提供有关资料。当时，大部分资料散见于各种史料和后人的考证文章中，查询工作一下变得千头万绪。

在戚志芬提供的资料目录中，记者看到一份详实的记录：咨询材料从八个方面汇集素材，一是有关王昭君生平的专著；二是人物总传里的王昭君；三是妇女传记中的王昭君；四是史书中关于王昭君的记载；五是地方志里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六是报刊上的有关论文；七是笔记小说里的王昭君；八是有关王昭君的文艺作品，包括有关王昭君的剧种剧本等等，最终形成一份“有关王昭君的资料目录”。

依据戚志芬提供的线索，曹禺来馆阅读相关文献，为其完成剧本打下坚实的文献史料基础。

“戚志芬前辈和曹禺先生的这段往事可以说是国图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的一个缩影。时过境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今的咨询服务借助技术延伸了服务的半径，现在很多国外的学者会通过网络联系国图提供咨询服务，有一些服务甚至会持续20余年。”张曙光告诉记者。

“相对于服务知识群体，近年来国图的读者服务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更具多样性。”典藏阅览部副主任陈慧娜介绍，2010年，国图首次开设了少儿馆，年龄在6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进入国图阅览。“以前小朋友是不能进国图的，而少儿馆让馆藏资源惠及孩子们，近年来我们还把最低年龄降至零岁。这种多样性在世界其他国家级的图书馆中是很少见的。”



从图书殿堂到书香园林

今年的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位于颐和园东北角的霁清轩书声朗朗。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文津奖颁奖仪式首次走出国门，探索“公园+阅读+传统文化”新模式，使读者既能感受园林中的书香韵味，又可体味历史之美、思辨之美、阅读之美。

时代在变迁，国图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其促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功能始终没有变，并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更迭。比如，1953年，国图举办的讲座，往往吸引上千人，经常会出现读者排长队入场券的场景。“那么多的人聚集在广场上，听一场讲座，可谓盛况空前。”社会教育主任廖永霞感叹。当年，老舍、郭沫若、田汉、丁玲、吴组缃、艾青等著名学者担任主讲人，各学科的前沿思想和学术观点在这里碰撞。从那时起，国图开始了社会教育和阅读推广的探索。

1984年至1985年，国图联合商务印书馆、北京市历史学会，共同举办面向世界的外国历史讲座，以响应当时国家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图的讲座活动迎来繁荣发展时期，“国图公开课”“M地铁·图书馆”“文津经典诵读”等特色阅读服务的社会效益进一步凸显。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从山林讲经到书院讲学，从书籍殿堂到公共空间，阅读始终伴随着民族的发展与壮大。

百年国图始终与时代同行，以专业服务助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丰富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

责任编辑：吴迪

图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一辈国图古籍修复师正在修复《赵城金藏》。

图②：上世纪50年代，老舍在国图作报告。

图③：国图公开课录制现场。

图④：2021年4月23日，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揭晓仪式在北京颐和园举行。

图⑤：国图总馆北区室内场景。

本版照片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外观